

多元語境中的家庭倫理危機與倫理關係重構

——關於近年中國家庭倫理劇中倫理危機的研究

◎ 吳海清 張建珍

一段時間以來，家庭倫理題材的電視劇成為許多電視台的熱播劇目，其中不少被安排在黃金時間播出，並取得較好的收視成績和較大的社會反響，如《中國式離婚》等不僅獲得不少獎項，而且引發了關於倫理問題的廣泛討論。在這些家庭倫理劇中，有一類電視劇深入地展示了置身於社會轉型期的人們在家庭生活所遭遇的倫理衝突與倫理認同危機，如《中國式離婚》、《結婚十年》、《不回家的男人》、《穿越激情》、《空房子》等。這些電視劇或是表現社會與經濟轉型中的身份變化造成的家庭結構動蕩與以情感忠誠和責任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危機，或是表現了個人幸福倫理與責任倫理衝突所帶來的家庭震蕩和倫理危機，從而比較廣泛地反映了新的價值觀念進入到家庭和婚姻生活之後家庭成員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之間的深刻矛盾，揭示了以情感忠誠和責任為核心的家庭倫理在社會轉型時期遭遇到的合理性危機。

一 社會轉型與家庭倫理危機

在這些反映家庭倫理危機的電視劇中，有一些電視劇側重於表現社會與經濟轉型對人們自我認同、生活方式、情感體驗等方面發生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家庭倫理危機。

當代社會轉型帶來了社會結構的相對開放與社會階層之間流動性的增加，這使得人們的社會身份處在不斷變化之中。當人們的社會身份發生變化之時，他們的自我認同與認知世界的方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但圍繞他們的日常生活世界、尤其是家庭生活結構常常不會發生同步變遷，家庭成員基於共同生活經驗、普遍價值觀念之上的評價系統與交往方式也時常不會隨著人們社會身份的變化而及時變化，這就造成了新的自我建構與家庭生活世界之間的衝突。在這一獨特的語境中，一方面，社會轉型所造就的新的自我建構儘管具有其合理性，但無法獲得生活世界的充分認可，甚至會因其過於強調自我認同而被生活世界否定，這就造成轉型期的自我同一性不僅難以順利地建立起來，而且還會出現各種衝突與焦慮；另一方面，傳統的家庭結構與倫理規範在新的自我建構面前也暴露出片面性，無法獲得這種自我的完全認同，也無法有效規範其選擇與行為，這樣一來，傳統的倫理規範的合理性在社會轉型的語境中就喪失了其自足性，而需要重構自己的內涵並為之提供充分的辯護。於是，無論是自我建構還是家庭生活世界的建構在社會轉型時代都被帶入到不確定性、矛盾性和焦慮之中。而目前播出的家庭倫理題材的電視劇有不少就表現了社會轉型中人們重構自我和家庭倫理生活時所面臨的困惑與危機。

電視劇《中國式離婚》講述的就是社會轉型時期價值觀念變遷與婚姻生活規範之間的衝突給個體造成的精神焦慮及其導致的家庭危機。在電視劇中，由於個人的才能、奮鬥、對市場規則的選擇以及市場的自由開放等，宋建平的经济條件、社會身份都經歷了由社會邊緣到中心的過程，而物質和社會條件的轉變也帶來了宋建平以自我為中心的認同感和家庭關係重新定位。他感到建立在共同奮鬥和彼此要求之上的婚姻關係成為自己生活的負擔，而妻子林小楓無端的猜忌與近乎瘋狂的敏感更是給他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因而，無法擺脫的家庭生活就成為宋建平冷漠、焦慮和痛苦的根源。另一方面，作為宋建民的妻子，林小楓卻沒有完成自我認知的轉換，依然停留在對家庭和婚姻關係穩定性的強烈認同上，這種對穩定性和安全感的需求導致她極端的心理狀態並採取極端形式來維持婚姻關係，其結果是自我的分裂和努力的失敗，其倫理選擇的合理性也因其近乎瘋狂的舉動而變得令人無法接受。

儘管宋建平與林小楓之間的衝突有他們個人性格方面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是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個人社會身份、自我認同的變遷與傳統的家庭倫理規範之間的衝突。在宋建平看來，當他的經濟與社會身份發生變化時，他的自我和社會形象就不能再用自己不得意時所使用的那套話語來描繪，而需要用身份、成功、尊重、理解、個人獨立性等修辭來建構，即使在家庭生活也應如此，但現實的家庭生活卻用責任話語、日常瑣談等回應他的要求，這就造成了他的自我認同與家庭承認之間反差；與此同時，對宋建平來說，在他認同一套新的以自我為中心價值話語之時，他又深深地體會到家庭責任話語的合理性與正當性。這樣一來，宋建平就被置於兩種衝突之中，一是其自我形象設計與家庭認同的衝突，一是兩套不同的價值話語合理性與片面性在他內在世界中進行的激烈辯護。因此，自我同一性無法在現實生活世界建構起來的焦慮就成為宋建平生存中的根本問題。對林小楓來說，儘管宋建平的社會身份與自我感受已經發生了變化，但她沒有改變也認為無需改變自己與宋建平之間的話語交流方式與交流內容，甚至常常懷疑宋建平所渴望的倫理話語具有有意貶抑、拋棄兩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意圖；面對變動的世界，林小楓也不打算改變自己認知方式，而是用家庭穩定性和倫理責任話語來描述生活世界，當生活世界中許多交往方式與自我設計超越了她的話語體系時，她就開始懷疑世界的正常性，並努力用自己的倫理話語規範生活世界、譴責不能為自己所認同的世界。於是乎，林小楓的生活也就處在分裂的狀態之中：一方面是變化的世界，一方面是自我對世界的固定想象；一方面是雙方新的生活方式與自我設計在呼籲新的交流話語，一方面是對傳統家庭倫理話語的執著信念。可以說，正是社會的變遷及其所帶來的自我設計的變化與傳統家庭倫理話語之間不一致造成了宋建平與林小楓兩人之間及各自心理世界中的衝突。

不同於《中國式離婚》，《結婚十年》則表現了在物質追求已經合理化甚至成為人格結構中重要的因素之時人性純真與物質欲望之間的衝突，反映了人們在社會身份與經濟條件發生激烈變化的社會轉型期重構家庭生活和自我認同的困惑。男主角成長婚姻生活從相互熱愛和真摯關心到相互衝突與彼此分離再到於懷舊中重歸於好的過程，也是成長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從卑微上升到成功最後又破產的過程，還是成長的自我由純樸到困惑再到回歸本真的過程。在這一過程，影響人們的情感態度、導致婚姻變故以及自我認同變化的常常是人們對經濟條件的追逐或放棄。當在社會地位與物質條件方面獲得成功時，成長的自我認同就會迷失在物質欲望之中，無法再認同家庭生活的平淡、真摯的情感和家庭責任的束縛，最終造成了家庭生活的解體。只有在人生挫折之時，成長才發現家庭的溫馨、人性的可貴與情感的價值，渴望重構整體性倫理生活。從表層邏輯看來，這部電視劇始終圍繞著物質欲望與純潔人性的對立來展開敘事，一方面是成長在物質欲望中的迷失，一方面是癡情不變的韓夢與成長的情感回歸。通過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電視劇力圖證明只有以情感與責任為核心的倫理生活才是人性的根本，物質欲望只會導致人性的迷失。但這種二元對立敘事包含著無法回避的自我解

構：敘事在強調物質文化非人性之時，又在韓夢形象中讓物質權威悄悄回歸。這樣一來，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一方面因過於簡單地將倫理和諧與物質滿足對立起來而顯得蒼白與缺少說服力，另一方面又因物質權威的暗渡陳倉而失去其感動人與規範人的合理性。因而，無論是整體性倫理生活的恢復還是成長自我的回歸都不能從敘事邏輯上找到有機統一的辯護。

可以說，《中國式離婚》、《結婚十年》都給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以家庭和諧為核心的倫理規範是否還是完美的和完全有效的？完整的家庭結構及其倫理規範的建構能否在忽視社會轉型壓力之下得到辯護？

二 個人幸福倫理與責任倫理的衝突

比較《中國式離婚》、《結婚十年》等側重於表現造成家庭倫理危機的經濟與社會根源，《不回家的男人》、《穿越激情》、《空房子》等則比較深入地觸及了個人幸福倫理同以情感忠誠與家庭責任為核心的倫理之間的衝突及其導致的倫理危機與家庭震蕩，探索了重構新的情感與理智關係的可能性途徑。

在這些作品中，主要人物的社會身份與經濟條件都沒有發生轉折性的變化，但他們在生活過程中不斷遭遇到來自家庭之外的各種刺激與觀念變動，這些逐漸培養了他們反思自我生活、追求個人幸福的意識。當這種關於個人幸福的感受與觀念積累到一定程度並被他們視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時，個人幸福與家庭責任之間的不統一就日益暴露出來，他們就開始質疑家庭責任倫理的片面性，甚至會誇大這種片面性。於是，他們的觀念世界與家庭生活就開始出現問題，從而導致了激烈的家庭衝突，也促使人重新思考重建家庭生活的可能性。

應當說，個人幸福倫理與家庭責任倫理之間的衝突同生活世界的變動是密切相關的。當代經濟與社會生活的相對開放，擴大了人們的活動空間和外在的刺激，增加了人們選擇的可能性和生活的複雜程度，也增大了生存競爭和生活風險，導致了對私人空間的承認和個人權利的強調。這一切使人們的生活包括情感生活具有了更多的變動性並能為這種變動找到合理性辯護，尤其是個人獨立與幸福的辯護。這種社會、文化與心理的變化也影響到人們的家庭與婚姻生活，其中有兩個方面比較突出：一是生活的開放性、選擇的多元性、價值的個人化與家庭倫理生活所要求的關係穩定性、情感忠誠性之間的衝突，一是家庭責任與某些情感欲望的合理化、個人的權利要求等之間的衝突。面對這兩種衝突，無論是強調個人幸福的合理性還是突出情感忠誠與家庭責任的合理性都只能產生片面性的結果，因此，人們開始以更加理性的方式看待生活中出現的衝突，力圖在個人的情感要求和婚姻和諧之間、在個人自由選擇與家庭責任之間建立起新的倫理規範。而要建立這樣的規範需要人們處理好情感與理智的關係，既不能單純地以感情態度也不能單純地把責任倫理作為處理生活關係的根據，否則，婚姻家庭就會處於危機之中，雙方追求的倫理選擇都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實踐。

《不回家的男人》講述的就是這樣的故事。故事由兩組矛盾交織而成，一組是男主角關偉在夫妻感情破裂之後重新建立的愛情與家庭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之間的衝突，另一組是女主角溫靜強烈的情感穩定性與純潔性要求和溝通的缺乏、各種情感與物質誘惑、生存競爭的壓力、過於封閉的自我意識等之間的衝突，正是它們造成了家庭生活的分崩離析以及人物心靈的痛苦。衝突的解決除了訴之於家庭中各種真摯的情感召喚外，更需要強化責任意識和建構理解寬容的倫理關係。在電視劇中，一方面，關偉、溫靜和關偉新的女朋友陸童等人在激情之後開始冷靜地反思各自的感情選擇與情感表達方式，從而認識到自己追求的倫理選擇的片面性，開始超越自我中心的倫理觀念，從家庭關係與相互理解的角度出發重新定位自己的幸

福；另一方面，溫靜也開始意識到片面執著於家庭責任與情感和諧並以之為自己偏激的行為辯護不僅會造成對家庭關係的巨大傷害，而且會遮蔽對彼此情感世界的真誠關懷與真正認識，因而她開始改變偏執的倫理譴責與報復，用情感呼喚與道德寬容來重構兩人的關係。正是這兩方面的變化使瀕臨危機的家庭倫理生活得到重建。當然，這種重建已經不再是簡單地回到過去的以情感忠誠與家庭責任為核心倫理生活中，而是包容了理解、寬容、尊重彼此獨立型等新內涵的家庭倫理生活。

《穿越激情》則以殘疾的妻子與成功的丈夫之間圍繞著情感追求與生活幸福而發生的種種關係為基本的情節，每一方都試圖在理性與情感、對方的生活幸福與自己的情感需要之間找到平衡點，但幾乎都無法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都意識到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只是需要彼此承擔責任與相互關心，還需要承認完整的情感和欲望實現的合理性。因此，妻子文薈就始終處在自己的情感需要與意識到自己不能給丈夫以完整的幸福的理智衝突之中，而丈夫陸野則處於對完整的情感生活的渴望與家庭責任、良心愧疚的矛盾之中。面對婚姻生活與情感需要，他們感到彼此都需要更加理性的態度，否則雙方只能生活在愧疚、猜忌、痛苦之中。

不同於《不回家的男人》、《穿越激情》的強烈戲劇性，《空房子》更側重於表現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問題，婆媳關係、子女教育、工作變動、房子裝修、飲食起居等等日常衝突構成了整個故事的主要內容。由於丈夫的大男子主義、妻子不注重生活情趣的營造、雙方在許多生活問題上幾乎沒有一次徹底的溝通以及生活過於依賴於慣性等等，日常的衝突最終引發了家庭的解體。儘管沒有一個貫穿整個劇作的主導事件，但這些日常的衝突依然包含著一個基本的問題：如何處理好平淡乏味的生活慣性、相互平等與溝通的生活倫理、歷久彌新的情感培養之間的關係，從而創造出一種值得過的生活？

三 倫理危機與開放的倫理敘事

比較早期的表現家庭危機的電視劇，如《渴望》等，《中國式離婚》、《空房子》等無論是在價值觀念、還是情節組織等方面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呈現出對各種倫理選擇的開放性態度。

在《渴望》中，儘管家庭結構也出現問題，但是倫理價值本身卻沒有遭遇到危機，造成家庭解體時是個別人的倫理缺失，而非倫理本身的規範性與合理性的不足。事實上，劉慧芳等所代表的忍耐、謙遜、善良、忠貞、犧牲等倫理價值卻是完全合理與自足的，這套價值不僅獲得劉慧芳周圍的人和觀眾的認可，而且具有相當強的社會整合力和權威，沒有其他的價值觀可以取代或者挑戰這套價值體系。相反，當王滬生離棄劉慧芳時，他就不是選擇了另一種生活價值，而是棄善從惡，成為惡的代表。這種善惡對立的價值觀決定了《渴望》的情節結構將極力突出善惡衝突：一方面是劉慧芳的心靈與行為的美好、她在苦難中堅守道德的努力、周圍人對她的同情與支援等，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善的本質意義及其社會價值；另一方面是王滬生的本質敗壞與欲望的醜惡、他最終的毀滅、人們對他的嫌棄等，由此表現個人主義價值觀是一種惡。

而《中國式離婚》、《空房子》等已經改變了這種善惡對立的價值觀及其所決定的情節模式，形成了更加開放的價值觀念和結構模式。從這些電視劇中，人們可以體會到，當代婚姻家庭倫理面臨一系列的問題：生活世界的變動性與家庭世界的穩定性、個人情感要求的合理性與家庭責任的規範性、價值選擇的多元性與家庭關係所要求的整體性等。在情節的展開

中，這些問題的各方都有其合理性，並能為其合理性提供生活實踐與觀念體系的證明，因此，這些問題既不能通過回歸以家庭責任為核心的倫理生活來解決，因為責任倫理常常抑制了個人權利、情感欲望實現的合理性，也不能通過張揚、承認個人權利而等閒視之，因為強調權利會帶來家庭結構的解體和倫理規範的喪失，而是需要在協調情感關懷、個人權利、倫理責任與相互溝通理解的交往理性基礎上重構家庭生活倫理。就當前的中國社會、文化轉型所提供的生活實踐與價值觀念的可能性來說，這種重建只能是一個各種觀念與實踐就其合理性展開論證與表現的開放、未完成的工程，而不可能是一套將上述各方面整合為一體的解決方案。這種未完成性決定了表現家庭倫理危機的電視劇需要採取開放性的敘事結構。這種開放性的敘事結構具有諸多不同於早期家庭倫理題材電視劇的敘事特點。

首先，這些電視劇的敘事中心是情感忠誠與責任為核心的倫理規範的整體性危機及其所帶來的家庭結構的不穩定，而不再是個別人的倫理缺位造成的家庭危機。在電視劇中，以個體幸福為中心的個人主義倫理、某些物質追求和欲望實現的合理性、以愛情為核心的價值觀等都具有了各自的合理性，並成為人們可能選擇的物件，它們與家庭穩定所要求的倫理責任之間雖然不是矛盾的關係，卻也不是完全包容的關係，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衝突。這種衝突導致倫理規範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危機，由此帶來家庭結構的危機。

其次，自我認同的困惑、人格的分裂、選擇的痛苦、內在的衝突等就成為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徵。在電視劇中，幾乎所有人物都處在內心衝突和對自己的選擇、行為的反思困惑之中，宋建平、成長、關偉等都處在個人幸福與家庭責任、權利辯護與良心愧疚之中，而林小楓、溫靜、文薈等固然可以用家庭責任倫理為自己的行為提供辯護，但這種辯護不僅不能保證她們生活於其中的家庭結構的穩定，而且導致了她們對家庭責任倫理有效性與合理性的懷疑，她們每個人在最後都意識到自己對責任倫理的堅持給丈夫的生活幸福與心理造成的壓力，甚至為此而愧疚，就像楊紅英（《空房子》）那樣自立、信念堅定的人最後也只能是感傷、困惑與自我懷疑。無論人們如何從女性形象被扭曲的角度來批評這種敘事安排，但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以情感忠誠與家庭責任為核心的倫理危機確實對人們、尤其是對女性的生活世界與自我同一性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人們再也無法像劉慧芳及其同情者那樣依據某種倫理觀念為自己的行為提供完全充分的理由並建構同一的自我認同，也無法再根據這套價值觀念徹底說服別人、有效地判斷與整合周圍世界。與此同時，周圍的人對主要人物的態度也不再是單純的或者批判否定或者同情肯定，而是複雜得多的價值判斷與理解。

再者，在這些電視劇的情節發展中，經濟物質力量、個人的意志與才能、偶然的機遇、欲望需求、倫理道德等都可以成為劇情的推動力量，並常常是以正面或者中性的面目出現。情節本身也常常成為各種倫理選擇相互衝突、辯論、實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各種倫理選擇都會極力證明自己的合理性，批評其他倫理選擇的片面性。早期家庭倫理劇用單一的倫理規範作為主導力量來推動與整合各種要素，故事的情節結構也會盡力壓制其他倫理選擇的合理性表現。比較後者，《中國式離婚》等電視劇的敘事以更加開放的態度面對社會轉型期的衝突和倫理危機。

第四，危機的解決方式與力量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由於家庭倫理生活已經變成純粹的私人生活空間，因此衝突的協調與解決主要依靠個人的意志，而不受公共權力的影響，後者只是在雙方同意或者有違法的情況下才會介入。上述的電視劇中，倫理生活的重建常常是通過情感召喚、良心復蘇、責任意識、理性回歸、人性發現等方式來推動，這些都是私人化、個人化的活動領域，這也意味著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倫理主體有更多的自主性。而早期的電視劇中，解決矛盾衝突常常要依靠社會輿論和單位等體制性的力量，個人的意志與選擇常常顯

得弱小，乃至於被壓制。

最後，上述的電視劇都同時敘述了多個家庭的倫理危機，如《中國式離婚》、《男人不回家》都有三個家庭發生危機，而《結婚十年》、《空房子》也有兩個家庭出現了問題。這種危機的普遍性不只是敘事的複雜性與曲折性的要求，更是以情感忠誠與責任為核心的家庭倫理整合力量下降的結果。《渴望》等電視劇中的家庭危機則是個別的，而且具有偶然性，沒有給人普遍性的印象。

四 多元語境中整體性倫理生活的重建

當然，儘管這些電視劇面對多元價值選擇採取了開放性的敘事結構，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些電視劇無保留的認同了各種倫理為自己所提供的辯護。事實上，開放的敘事結構是要在多元化語境中重構家庭倫理生活的團結，而不是對個人幸福倫理的承諾。這樣敘事目的決定了開放的敘事結構也是一個複雜的敘事結構。

儘管多元倫理選擇的合理性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但各種倫理選擇的片面性在生活交往中也不斷地呈現出來，尤其是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價值觀不僅常常導致家庭破裂的結果，而且會把人物推到痛苦的境地，再加上婚姻家庭的合理性在當下依然是充分的、為社會所認可的，也內化在每個主體的自我建構中，所以，這些電視劇依然要重構家庭生活的整體性，只不過這種重構的整體性不再把某一種倫理觀念作為絕對的權威，而是具有開放結構的整體性。在這個結構中，涉及到婚姻家庭生活的個人選擇觀、責任倫理觀、情感幸福觀、自在快樂觀、家庭和諧整體觀等都可以進行平等的交流對話與互動，並通過開放的、不斷生成的交往互動來實現自己的合理性訴求，克服各自的片面性，從而在承認、吸收各種合理性基礎上重構家庭生活的整體性。這種獨特的整體性訴求決定了電視劇的敘事既要為整體性生活實踐提供更充分的合理性證明，以克服各種倫理選擇的片面性並為其合理性的展開創造空間，又必須不斷面對個人幸福倫理的質疑、吸收改造甚至實現後者的合理性要求。這意味著電視劇的敘事結構必須在各種倫理價值的相互衝突、抵抗、吸納、改造、裂縫、整合等關係之中展開整體性建構，以保證各種合理倫理要求的實現。

《不回家的男人》就是在這樣複雜的關係中展開敘事的。溫靜想要維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與情感的忠誠性，但她的自以為有充分倫理合理性根據的極端行為不僅給關偉造成了很多痛苦，而且也使自己的生活在經歷了一系列的衝突、報復、對話之後，溫靜意識到自己倫理實踐的片面性，感到了內疚，展開了反思，走出了自我封閉的空間，開始了在尊重關偉個人選擇的基礎重建兩人整體關係的嘗試，而關偉在品嚐了個人幸福倫理與家庭責任倫理的煎熬之後，也逐漸意識到個人幸福倫理的片面性，感受到家庭的整體性給人帶來幸福感。於是乎，兩人在獲得對個人幸福倫理與家庭責任倫理的內涵及其關係新的認識、體驗之後，又重新開始了家庭整體性的建構。

不過，這種家庭整體性的重構同傳統的一元論家庭整體性結構是不同的，前者肯定多元性並允許各種倫理選擇在其合理性基礎上的實現，這是一種在寬容與交流的基礎上形成的、包容各種倫理選擇合理性辯護與衝突的整體性生活構建，它不要求把各種倫理選擇組織成首尾一貫、有機統一、以某種倫理觀念為核心的倫理體系，而只要求各種倫理選擇在實現自己的合理性要求之時應當承認其他倫理選擇的合理性，能為其他倫理選擇的合理性提供空間，不要因為強調自己的合理性而壓制其他的選擇，要在交流、寬容的基礎上形成一個非強制性的整體空間。而一元論的家庭倫理則把情感忠誠與責任倫理作為絕對的元倫理，同其不相容的價

值選擇在家庭就沒有合理性、更沒有實現的權利。

在1994年播出的電視劇《過把癮》中，女主角杜梅想改變一下自己的髮型和衣服，把時尚與審美價值引入到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卻被周圍人視為對情感純樸真誠的家庭女性形象和家庭整體性關係的挑戰，並因而遭到了許多冷嘲熱諷。與杜梅不同的是，在《空房子》中，丁亞蘭告訴楊紅英，要想維護家庭關係的整體性就必須把時尚的生活方式與形象設計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而不能停留在對夫妻整體性關係的保守性想象上，以為依靠責任倫理就能保證整體生活的穩定。儘管人們可以批評丁亞蘭的觀點是從男權的視角來規範女性的價值，是對女性獨立性的壓制，但丁亞蘭對夫妻關係中審美性與激情的強調畢竟是責任倫理之外的又一種生活觀念的選擇，它意味著重構家庭生活整體性必須包容並承認審美、時尚、個人幸福等生活選擇。

而且這種多元化語境中整體性倫理生活的重構還是一個隨時吸收語境中新的倫理選擇、並接受後者的質疑而不斷調整自己的內部結構的過程，這決定了重構的整體性倫理生活是一個向多元化語境不斷敞開的空間。這也使新的整體性倫理生活具有了不同於封閉型一元論家庭倫理的開放性特點。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結婚十年》中成長與韓夢整體性倫理生活的重構是通過人性回歸而完成的，而事實上，這種重建是建立吸收歷史語境中其他價值觀念的基礎上。從成長來說，處在新的感情生活起點上的他已經不是當初那個純樸、衝動、一心只想發財的年輕人，而是在複雜的人生經驗與深刻的自我反思之後回歸到純潔人性的主體，這個反思性的主體已經吸收並戰勝了物質欲望對人性異化，獲得了生存於物質世界中的自由。從韓夢來說，敘事在保證她純潔真情的形象之時，為她的形象增加許多新的因素，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經濟與社會地位方面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為韓夢與成長的關係注入了新的可能性，這就是韓夢在情感關係中可以從以前的委曲求全轉換到重構家庭整體生活時的主動地位。當然，敘事在賦予韓夢形象以物質性內涵時使用了完全不同於當初塑造成長形象時的修辭策略。在成長形象中，物質文化是作為人性異化的因素在場的，成長最終完全為物質所扭曲；而在韓夢形象中，物質文化則是作為創造生活幸福的一種資源在場，正是這種物質基礎為韓夢與成長倫理生活整體性的重構提供了可能性。在《空房子》中，丁亞南重建婚姻整體生活過程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原因就在她過於執著於純情想象、不能向多元化語境敞開。

總之，在價值多元化語境中，傳統的家庭倫理生活越來越受到來自語境的多種壓力，這種壓力使得整體性倫理生活的敘事難以用一元化倫理來規範人們的關係、賦予生活實踐以同一自足的意義，而需要向多元語境開放。但由於歷史、道德、文化和現實等方面的原因，這種開放不是徹底否定整體性倫理生活，而是要在多元文化的語境中通過交完互動的結構重構家庭生活的整體性，並隨時吸收語境中新的倫理選擇的合理性訴求。這是一種開放的、寬容的、未完成的、不斷重構的整體性倫理生活，而不是封閉的、一元化的結構。

吳海清 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2002級博士生，北京舞蹈學院講師。

張建珍 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2002級博士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一期（2005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